

# 論毛澤東治黨治國的一條思想主綫

楊 波、吳偉佳\*

毛澤東思想具有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但概而言之，他的主要思想就表現在兩個方面：戰勝敵人，治黨治國。戰勝敵人用的是軍事辯證法；治理黨政用的是人民群眾觀。因此，民眾觀是他治黨治國的一條思想主綫。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提法與目前學術界表述的“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大法寶”的提法不一致。的確，毛澤東的民眾觀才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法寶。因為，統一戰綫是最大限度的團結一切民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和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武裝鬥爭是動員了全體人民群眾的革命戰爭；而黨的建設的本質內容就是要建設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黨。可見歸根到底，民眾觀是貫穿毛澤東思想三大法寶的一條主綫。是毛澤東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真理性和價值性兩個方面論證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總目標。它認為，一方面從真理性角度講，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互動史，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變革史。通俗地說，也就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和物質財富的分配不斷地、艱辛迂迴地朝着相互適應的目標調整的過程，其結果便是越來越多的民眾享用到社會生產力創造的財富，所以，共產主義是唯物史觀的真理追求。另一方面從價值角度講，伴隨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基本矛盾運動不斷向更高階段發展，經濟社會條件越來越向着符合人類本性的狀態改進，社會越來越弱化形形色色異化力量的支配，而逐漸實現“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所以，實現全社會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唯物史觀的最高價值追求。唯物史觀的真理追求和價值目標告訴我們：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積累是

以全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由解放為目的的。也就是說：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程度是以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狀況為標誌，而不是少數人。因此，為數眾多的廣大民眾才能代表歷史，才能決定歷史走向，才是歷史的主人，才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長期艱苦的實踐中，開創性地提出了毛澤東的民眾觀，在他看來，“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sup>1</sup>“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sup>2</sup>“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sup>3</sup>共產黨的事業及中國的一切事業必須紮根於這個工農大眾之中，才可能取得勝利。可見，他所指的民眾，就是以工農兵為核心的，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大眾。而他的民眾觀又是一個系統性的整體，奠定了他全部世界觀的基礎。本文認為，毛澤東民眾觀的內容主要體現於五大方面：一是黨是紮根於人民的黨；二是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三是提出深入社會實際，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為中國民眾的利益而奮鬥，是中國青年成長的正確方向。四是提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一方面，要與工農民眾融為一體才能克服自身弱點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知識分子還需承擔帶動民眾知識化的歷史重擔。五是提出為民眾服務是文藝工作的大方向，中國的文藝工作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事業。為此，文藝工作者必須從立場和情感上貼近民眾。這些觀點整體上還是正確的，但有些部分，今天看來在細節上也確有值得商榷之處，而我們在此仍予以原本的表述，並對其予以“謹代表個人意見”的評價。但總體認為，他的觀點在根本上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 前者為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廣東行政學院哲學系教授，後者為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研究生部碩士研究生

## 一、黨是紮根於人民的黨，聯繫群眾是判斷黨的好幹部的根本標準

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深深紮根於廣大工農民眾之中，緊緊依靠他們，才能具有生命力。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sup>4</sup> 而在這個既依靠群眾又領導群眾的過程中，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靠各級領導幹部去維繫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sup>5</sup> “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繫群眾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sup>6</sup> 因此，是否能夠緊密聯繫群眾就是判斷黨的好幹部的根本標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黨的幹部必須堅守黨的最高宗旨。二是黨的幹部是聯繫黨和群眾的橋樑。三是黨的幹部做人民的公僕是保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基礎。

### (一) 共產黨的幹部必須堅守黨的最高宗旨

黨的幹部是將黨的總目標和具體的工作目標相統一的主體，然而，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每天面對的都是具體工作，解決的都是具體問題，制定的都是具體工作目標。但是，所有這些具體工作目標都不能背離黨的最高宗旨，即：為人民服務。所有的工作目標都必須圍繞着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黨各級領導幹部的主體作用。毛澤東說：“我黨規定了中國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體的工作路線和各項具體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往往記住了我黨具體的個別的工作路線和政策，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楚的革命者。在我們執行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時候，就會迷失方向，就會左右搖擺，就會貽誤我們的工作。”<sup>7</sup> 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對於如今而言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 30 年來，黨內一些幹部往往忘記了這一點。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中，只注重政府的政績和財政收入而忽略了廣大民眾的利益，使具體工作目標與黨的總目標相背離，因而出現了黨群關係的危機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因此，有必要在時下重新強調幹部的這一主體作用，使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始終成為保證各項工作不背離黨的總目標的中堅力量。

### (二) 黨的幹部是黨和群眾溝通協調的橋樑

黨以甚麼樣的方式實現對革命和建設的領導，這直接關乎着黨的事業的成敗。毛澤東主張實行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說到底，就是聯繫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而黨的各級幹部正是聯繫黨和群眾，將黨的政治目標和重大決策普及並落實到人民群眾中去，又將群眾的問題和要求反映到黨內的橋樑。

黨的形象是靠各級領導幹部去體現，黨的各項政策是靠各級領導幹部去貫徹的。各級領導幹部將黨對人民實行的政治原則和重大決策普及並貫徹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使人民群眾在思想上和黨的政治目標保持一致性。同時，黨要通過自己的各級組織、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以及廣大黨員的模範作用，帶領人民群眾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而奮鬥。這樣，黨的幹部就發揮了政治、組織、思想領導的職能，並確保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到貫徹執行。毛澤東說：“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sup>8</sup> 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主體就是各級領導幹部，他們就是瞭解民意、貫徹黨政國策的紐帶。

如何從群眾中來？就是要貼近民眾，反映民意，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這是形成正確意見的基礎。毛澤東在 1934 年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說：“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群眾的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sup>9</sup>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關心群眾。黨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是接觸人民群眾最直接的幹部，必須時時刻刻關注人民群眾的聲音，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多辦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這樣才能夠保持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繫，保持黨服務為民的先進性，黨的幹部必須牢固樹立“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的思想。同時，黨的幹部還需要不斷的教育和引導群眾，讓群眾正確認識自己的合理利益，“並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sup>10</sup>

如果沒有黨的幹部的橋樑作用，那麼黨將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黨，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黨；如果沒有黨的幹部去教育、組織和團結群眾，黨和群眾的聯繫就會脫節，黨就無法實現對群眾的領導，也就無法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務。因此，黨的幹部既是群眾的教育者，組織者和帶頭人，又是能密切黨群關係，反映民生民情，是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就此一點，如今

的領導幹部也是多有欠缺的。如果各級領導幹部們都能及時瞭解民情和凡事從民眾的需要出發，上訪事件及維穩成本也就自然會大大降低了。可見當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橋樑作用是多麼的需要強調。

### （三）黨的幹部做人民的公僕是保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基礎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共產黨員就是由人民選舉、受人民監督為人民辦事，並隨時可以被人民罷免的“社會的負責的公僕”。無產階級政黨不同於其他政黨，“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sup>11</sup> 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觀點，並將其運用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設中。他曾說“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隨時隨地都要念叨‘爭取群眾’，這是共產黨的護身法寶，是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法寶。丟掉這個法寶，革命就要失敗，共產黨就一事無成。”<sup>12</sup>

他認為，執政與為民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執政黨的執政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要想保持住黨的執政地位，就要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能脫離人民。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一貫強調黨的幹部要做人民的勤務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sup>13</sup> “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託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sup>14</sup> “我們一切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sup>15</sup> 人民不僅養活和培育了我們，而且把權力交給了我們，老老實實當人民的公僕，一切言行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便是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的。幹部手中的權力，從本質上來說，是黨和人民的權力，只能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志，為人民謀福利，絕不能把它當成個人手中的特權，絕不能濫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或者少數人謀私利。只要辜負了人民群眾的信任，人民就有權撤換和罷免他們。因此，堅持黨的幹部是人民公僕的思想，對於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保持黨的執政地位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還認為，黨的幹部要永遠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必須正確地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方面，要擺正主人與勤務員的關係。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人民群眾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黨的各級幹部都是人民的

公僕。每個幹部不僅要在認識上，而且要從行動上擺對這種關係。他強調：共產黨員絕不可能脫離群眾，絕不可高踞於群眾之上，做官當老爺，絕不可只顧個人發財。脫離群眾，欺壓人民，走向反面，最終都將走向覆滅。另一方面，要正確對待人民賦予的權力。黨的幹部，不論自己手中掌握多大權力，都是黨和人民根據黨的事業和黨的工作的需要授予的，它表明黨和人民對幹部的信任。如果濫用職權，搞特權，以致違犯黨紀國法，那就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毛澤東從馬克思的黨建觀出發，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同於其他任何階級的政黨，它“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sup>16</sup> 所以，共產黨的幹部，做好人民的公僕才是保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基礎。而這一點對於如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更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 二、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毛澤東認為，黨的群眾路綫中核心的一條應該是保障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他指出，國家機關的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依靠群眾，確保人民群眾在國家的主人翁地位。因此，提升群眾的社會地位是國家機關的根本職責。

### （一）組織和支持人民群眾參政議政

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主要體現在對國家的管理上。他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個權利，就沒有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sup>17</sup>。因此如何實現國家管理上由各級黨政負責的少數專職管理者向人民群眾參與管理的過渡，一直是毛澤東所關注的問題。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所能實現，重要的是普遍吸收勞動者來管理國家，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基於這種認識，“文革”前，毛澤東試圖通過“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來實現人民群眾參與基層管理，1963年又試圖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解決基層政權中存在的問題。在這些探索性的試驗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之後，他便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當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舉動，還有其更複雜

的社會原因)，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來解決工人、農民群眾管理國家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他支持工人、農民“奪權”，建立新的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還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特別是要佔領上層建築等等。於是，除工代會、革委會外，又派出工宣隊，住進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從而實現工人階級管理上層建築。但由於過多地估計了黨的陰暗面，把一些犯有脫離群眾、侵害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者當作“走資派”去過重的打擊，給一些別有野心的野心家們製造了機會，最後造成全社會的混亂。但想通過這場政治運動來解決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尋找民眾參政議政和制約權力的渠道，無疑是毛澤東深層的思想動機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是錯誤的，可依靠群眾制約權力並致力於貫徹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探索卻是寶貴的。毛澤東的失敗教訓，在於沒有找到制約權力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的正確途徑。

## (二) 堅持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認為，要保證“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實現，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有效地防止個人獨裁，防止把權力變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又能防止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阻礙權力有效施行的弊端。因此，毛澤東說：“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與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sup>18</sup>。從上述毛澤東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代表人民群眾掌權的政府，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全在於“真正代表民意”並執行“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若不是這樣，就失去了民主集中制的本來用意。1962年，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當時一些領導幹部中存在的不讓人民講話，不讓群眾參加管理的霸權作風，專門就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作了論述，指出：“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

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甚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sup>19</sup>他把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和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建設聯繫起來，和保持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聯繫起來，深刻說明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對於代表人民掌握權利的政府的重要性。從這一點來看也能說明：毛澤東當時是想要解決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調整問題，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度和經濟分配制度，以保證生產力的發展所帶來的成果能夠惠及全體民眾，而並不是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毛澤東不懂得發展經濟，只知道搞政治運動”。

## (三) 加強人民群眾對當權者和管理者的監督

前面說到，人民群眾把本質上屬於他們的權力交給自己的代表——國家各級黨政負責人，讓這批專職管理者來替自己管理國家事務。因此，這批專職管理者，與任何舊的管理者不同，他們不是高踞群眾之上的統治者，而只是執行人民群眾意志的“社會公僕”。但如何保證人民群眾授予各級領導者的權力不被濫用而只能始終為人民謀利益？如何防止“社會公僕”與“主人”地位的顛倒？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關注的問題。馬克思曾經在《法蘭西內戰》中談到：“舊的國家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它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個爭權奪利的黨派和冒險家彼此爭奪的對象”<sup>20</sup>。為了防止這種現象在工人階級掌權的國家出現，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基礎上，規定“從公社委員起，一切公職人員都只領取相當於工人的工資”<sup>21</sup>，取消舊的官吏享有的一切特權及公務津貼。馬克思認為，國家公職人員在物質生活上不超過工人，可以防止一些企圖為發財而當官弄權的人鑽進幹部隊伍。列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經常論及的中心問題也是如何防止共產黨員，國家幹部脫離群眾，變成官僚主義者，變成社會的主人。他說：“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有甚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sup>22</sup>毛澤東繼承了馬列主義這一基本思想，最擔心的莫過於黨的領導幹部脫離群眾，形成特權階層。他說：“縣委以上的幹部幾十萬，國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sup>23</sup>對此，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建

議，論述了在中國條件下反對官僚特權的根本辦法就是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主要是監督)。只有讓人民群眾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奪取全國政權後，在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憲法中，明確規定各級人大及其常設機關，是最高權力機關，同時又行使監督權；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接受群眾的監督。為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者的監督，毛澤東提出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的管理形式，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社員代表大會制等群眾管理形式，以實現讓人民群眾來監督政府和各級領導者。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一系列具體的方針與措施，諸如從嚴治黨，對侵害群眾利益而不改悔的人進行撤換、罷免等，所有這些無不為了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

可見，毛澤東在建國後，始終在思考和探索着如何提升人民群眾在管理國家和監督權力中的作用，雖然他的探索是失敗的，但他的思考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

### 三、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人都要向 工農民眾學習

毛澤東的群眾思想不僅體現於對黨的領導幹部以及黨和國家的執政宗旨中，還體現於對知識分子和青年人的要求中。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青年成長，並一貫強調要努力將中國青年培養成為革命和建設的生力軍。青年是朝氣蓬勃、具有鮮明革命性的群體，他們勇於承擔改造社會、再造中國的歷史重任。1929年，毛澤東指出：“帶着新鮮血液與朝氣加入革命隊伍的青年們，無論他們是共產黨員或非黨員，都是可貴的，沒有他們，革命隊伍就不能發展，革命就不能勝利。”<sup>24</sup> 青年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成長和學習的過程，每一代人都要經歷青年期的磨練最終步入成年，其思想和行為也隨之發生變化。青年成長是青年群體從不成熟向成熟階段的發展，需要社會的教化引導，需要找到正確的道路。那麼，如何正確地指引和培育中國青年健康成長呢？毛澤東強調了兩點。

#### (一) 中國的青年們要樹立為全體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奮鬥的世界觀

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的出路和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就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

中國。而這個“社會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勾結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老百姓的獨裁主義，而是為全體民眾謀利益的社會主義，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基於這一觀點，毛澤東提出，“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sup>25</sup> 青年人應當樹立為全體民眾謀利益的胸懷和理想，把自己的成長與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結合起來，才能有所作為，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的棟樑。

#### (二) 深入社會實際，與人民大眾相結合是中國青年成長的正確方向

毛澤東認為，青年從書本上學到的東西是不完全的，是空洞抽象和容易變化的，還必須深入民眾，接觸社會，懂得工人農民老百姓的思想、生活、工作，瞭解工廠、農村的實際情形，將所學與所用相結合，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幹家”。在他看來，青年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主要有兩條：一方面在黨的指導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並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去，喚醒更多青年，喚醒工農群眾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使思想的力量轉變為現實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理論的東西終究是要與實踐相結合的，青年還需要到群眾中去，虛心向群眾學習，這正是中國青年實踐和成長的最好方式。他說“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一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sup>26</sup>

毛澤東強調，中國革命是為了工農民眾的解放，革命也必須依靠工農民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青年的自然缺點是缺乏經驗，部分青年知識分子還存在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理想主義的弱點，因此，號召知識青年“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sup>27</sup>。他甚至把青年是否堅持在實踐中與工農結合作為衡量青年革命的標準，認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甚麼做標準呢？拿甚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sup>28</sup>

可見，毛澤東號召青年們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目的是希望青年們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正確解決為甚

廢人的問題，瞭解中國的國情，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樹立進步的人生觀。確切地說，就是希望青年們在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充分地認識工農群眾是中國各項事業的基本力量，中國青年要想能夠在未來中發揮好自己的作用，就必須懂得與工農打成一片，在實踐中虛心地向工農群眾學習，才能夠更有效地積累知識，增長才幹。

建國後，毛澤東又提出中國的教育應以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為根本目的，強調“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青年培育思想。而這一思想如今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從世界範圍來看，讓青年人更多的走向社會，貼近生活已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宗旨。改革開放的今天，黨也始終堅持引導青年在社會實踐中向人民群眾學習，只不過隨着社會的發展，青年實踐的內容也在不斷地豐富起來。2011年，胡錦濤發出青年大學生要“向實踐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的寄語，強調了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要注重實踐性、群眾性，重視知行合一。在改革開放，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的背景下，“向實踐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的再次提出，既為高校人才培養提供了方式方法(即在教育活動中增加實踐比重，引導青年學生深入基層和民眾)；又指明了青年工作的目標和方向，同時也再次旗幟鮮明地強調了黨在青年人才培養上的實踐取向和群眾導向，闡明了高等教育的歷史責任和社會擔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仍然希望並強調青年在實踐中瞭解國情，瞭解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瞭解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和人心所向；黨希望青年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幹，把自己的力量與人民的力量融和在一起，樹立為祖國奉獻的信念。<sup>29</sup> 作為現代青年學習和成長的重要方式，毛澤東主張“向群眾學習”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在社會實踐中獲得了有力驗證。

#### 四、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民眾觀

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是指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可缺少的社會力量。知識分子是對現實感覺最敏銳的群體，在社會變革中往往表現得最為激進。

毛澤東看到了知識分子在社會進程中的重大作用，但同時又認為知識分子的敏銳和激進往往缺乏與中國國情的結合。因此宣導：中國知識分子要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才能發揮好自身的作用。

#### (一) 知識分子要與工農民眾融為一體

黨對知識分子的作用從整體上還是予以肯定的。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着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sup>30</sup> 他還說“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門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人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綫。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sup>31</sup> 的確，黨在革命的每一個時期，都吸收大量的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幫助他們不斷進步，並且將優秀的知識分子吸收入黨。

但是，毛澤東又認為應該從知識分子的出身和立場出發，把知識分子劃分為“小資產階級”行列，認為知識分子大多數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與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農群眾大有不同，因此具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雙重性，他們頭腦中並非僅僅存在無產階級一種意識。知識分子的這些特點使其在階級立場上往往具有“動搖性”，“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他們往往是“動搖的”，因此，知識分子只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才能夠把革命堅持到底，才是可靠的。毛澤東甚至把知識分子是否“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看作是判定知識分子革命之高下的惟一標準，他強調：“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相結合。”<sup>32</sup> 也就是說，只有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中國知識分子才能真正為人民的事業發揮作用。因此，知識分子必須對自己的作用有個正確的評估。

應該說，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是建立在戰爭時期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的過於偏激的觀點。他沒有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開始的戰爭年代追求共產黨時，就更多的是為了信仰，而不是為了土地等生存利益。而建國後，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又被直接移植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知識分子造成極大的傷害。但從民眾觀的角度，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要克服“書生氣”，要與民眾結合，瞭解民情、瞭解國情，才能從實際出發，發揮好自己。這些觀點還是深刻而寶貴的。

#### (二) 工農民眾須在知識分子帶動下知識化

毛澤東還認為，知識分子在與工農結合中也帶動社會知識化。因為，知識分子在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中一方面改造自身的世界觀，另一方面，也帶動工農群

眾朝知識化方向發展，對消滅工農群眾缺乏文化的現象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有利於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彌補各自的缺陷。正是在這裏，突出體現了毛澤東關於“作為黨的依靠力量的工農民眾也是需要教育和提升的”重要思想，這構成了他的民眾觀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在毛澤東看來，工農民眾的知識化主要在於兩個方面：第一，工農民眾需要更多更好的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是吸收人類所有文明成果而發展起來的科學理論體系，要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專門的理論素養是不可能的。從這一角度講，知識分子能夠普及馬克思主義，也有能力成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橋樑。第二，共產黨人改造舊制度、建設新制度的偉大事業不可能在民眾文盲數量極大的情況下實現，毛澤東在《必須給人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一文中說：革命的目標“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sup>33</sup>，因此，廣大的工農民眾必須提升文化知識水平，才能達到黨的建設目標的要求。而廣大的知識分子是宣傳革命的理論、組織工農大眾的主力軍，也是宣傳鼓動和輿論製造者，是推進社會文明的一種力量，承擔着“在與工農結合中改造自身，又在發揮作用中帶動全社會的知識化”的雙重使命。今天，這一思想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品質。”<sup>34</sup>

總之，在關於知識分子的群眾觀上，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要與工農民眾相結合，同時，也強調工農民眾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的知識化，即：工農民眾與知識分子的相結合。但後者在執政後幾乎完全被弱化了。

同時，隨着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潰敗，被劃為“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了階級改造的對象，並日益把他們的腦力勞動與工農的體力勞動對立起來，嚴重影響了知識分子們正常的發揮作用。直到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明確指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情況才得到緩解。但本文認為，直至今日，黨在“如何科學而合理的管理知識分子，如何適度得當的與知識分子們打交道、如何使工農民眾知識化、特別是使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們知識化而不是文憑化”這些問題上，仍是需要探索的。

## 五、關於“文藝工作”的民眾觀

工農民眾是黨的事業根基，作為黨的事業的組成部分的文藝工作的發展，也自然離不開“人民大眾”這一根基。毛澤東認為，為甚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sup>35</sup>。

### （一）文藝工作的大方向是為民眾服務

毛澤東認為，文藝具有社會意識形態的性質。他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sup>36</sup>這裏所說的文化，也包括文藝在內。也就是說，文藝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同時，又反作用於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因此，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事業，“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sup>37</sup>，就是要反映和推動社會主義政治和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使文藝紮根於民眾之中。一句話，也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從根本上講，這是一個弘揚社會正義的大方向，它表達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追求。而在形式上毛澤東又認為是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因此原本上，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元化表達形式並不衝突，而是辯證的統一。但對於這一點，黨在多年的實踐中並沒能合理的把握。其偏激之處在於沒能理解到：不論是表現百姓生活還是帝王生活、不論是表現歷史人物還是現實人物、不論是採用荒誕搞笑還是莊重嚴謹的方式，只要表達了真善美、弘揚了正義感、堅持了符合歷史規律的東西，就都應該被認可為是堅持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我們欠缺的正是這種具有哲學高度的理解力。

### （二）文藝工作者要從立場和情感上貼近民眾

確立了文藝工作的大方向，接下來就要解決文藝工作者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這需要從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和情感上入手。文藝需要轉變立場，是因為黨在延安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各種正確主張得到各界人士的擁護，大批文化人湧入抗日

根據地，但他們大多數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滿腔熱忱的用自己的作品為抗戰服務，但服務對象不同了，而他們的作品在靈魂深處表現出來的東西還是與工農兵民眾的生活有距離，在思想、情感、立場方面還需要轉變。毛澤東認為，“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正確的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文藝。”<sup>38</sup> 可見，這又解決了文藝工作者該如何做到為民眾服務的問題。

應該說，毛澤東文藝觀仍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她閃耀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光輝，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代，他們在一些論著和通信中有不少關於在文化方面要為無產階級爭得地位的言論，但文藝的方向問題還未提上議事日程。馬克思曾旗幟鮮明地指出文化的人民性，他說：“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畫家也不是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的)，它的歷史個性以及那種賦予它以獨特性質並使它表現一定的人民精神的東西——這一切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說來都是不合心意的。”<sup>39</sup> 恩格斯滿腔熱忱地讚頌工人階級創造的文學：“無產階級給自己創造了一種自己的文學……這種文學的價值是遠過於一切資產階級文學之上的。”<sup>40</sup> 列寧處在俄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有了較大發展的時代，他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sup>41</sup> 然而，把他們的理論用於中國革命的文藝實踐的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的創造性不僅在於指出了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方向這個根本性問題，而且解決了文藝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問題。儘管他的具體論述中大多是針對過去

的時代情形，但其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核心思想對於今天與未來都是中國文藝發展的根本指南。

但是在黨的多年實踐中，的確也需要反思如何解決好“社會主義文藝觀”的問題。比如：需要處理好“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元化表達形式的辯證統一。從本質上講，強調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這是一個弘揚社會正義的大方向，它表達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追求。而從形式上講，毛澤東又認為是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因此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元化表達形式並不衝突，而是辯證的統一。但對於這一點，黨在多年的實踐中並沒能合理的把握。其偏激之處在於沒能理解到：不論是表現百姓生活還是帝王生活、不論是表現歷史人物還是現實人物、不論是採用荒誕搞笑還是莊重嚴謹的方式，只要表達了真善美、弘揚了正義感、堅持了符合歷史規律的東西，就都應該被認為是堅持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我們欠缺的正是這種具有哲學高度的理解力。可見，在我們的文藝工作發展當中，仍有許多諸如此類的需要探索之處。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民眾觀所包含的以上五個方面內容是緊密聯繫、相互依存的。它說明毛澤東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個系統性的、連貫的思想體系，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它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歷史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說：“甚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sup>42</sup> 而他的上述五個方面的問題都體現出了這兩個基本問題。他的民眾觀，對於當下的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更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都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的社會轉型中的問題“歸根到底，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走群眾路綫，才能得到解決。”<sup>43</sup>

## 註釋：

<sup>1</sup>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頁。

<sup>2</sup> 同上註。

- 3 同上註，第 1031 頁。
- 4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3 頁。
- 5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26 頁。
- 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69 頁。
- 7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16 頁。
- 8 同註 1，第 899 頁。
- 9 《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60 頁。
- 10 同註 7，第 1318 頁。
- 1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3 頁。
- 12 蕭華：《江南的春華》，載於《人民日報》，1981 年 6 月 11 日。
- 13 同註 3。
- 14 同註 7，第 1128 頁。
- 15 同註 1，第 243 頁。
- 16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18 頁。
- 17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29 頁。
- 18 同註 5，第 383 頁。
- 19 同註 17，第 296 頁。
-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52 頁。
- 21 同上註，第 154 頁。
- 22 《列寧專題文集 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8 頁。
- 23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25-326 頁。
- 24 共青團中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年，第 128 頁。
- 25 同註 9，第 302 頁。
- 26 同上註，第 300 頁。
- 27 同註 1，第 1079 頁。
- 28 同註 9，第 301 頁。
- 29 楊林香：《中國共產黨培育青年的歷史經驗》，載於《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
- 30 同註 1，第 1082 頁。
- 31 同註 9，第 319 頁。
- 32 同註 5，第 559 頁。
- 33 同註 6，第 564 頁。
- 3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77 頁。
- 35 同註 6，第 541 頁。
- 36 同註 5，第 663 頁。
- 37 同註 1，第 848 頁。
- 38 同上註，第 857 頁。
- 39 同註 11，第 153 頁。
- 40 《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第 263 頁。
- 41 《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66 頁。
- 42 同註 1，第 853 頁。
- 4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30 頁。